

泉州宗教石刻艺术漫谈

- ◆ 李秀治 (厦门大学历史系)
 ◆ 吴文娟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 吴诗池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省泉州市是国务院公布的中国第一批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泉州,早在南朝时就开始与外国有友好往来,至唐代已成为中国四大海外交通商港之一。北宋时,泉州设置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南宋时,泉州跃为中国两个最大商港之一,同广州齐名,此间已与 70 多个国家通商往来。到元代,泉州海外交通步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已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港内“风樯鳞集”,“四海舶商,诸蕃琛贡”^①。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取道泉州出海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元至正二年(1342 年)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来到泉州,亲眼目睹泉州后渚港“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的盛况,而誉之为“世界唯一之大港”^②。正由于泉州于唐及宋元时期对外商贸往来的繁荣昌盛,从而促进了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有机融合,并构成泉州的一个重要特色。保存在地面上的文物十分丰富(尤其宗教文物)也是其特色之一。拙文拟就泉州宗教文物中的石雕、石刻作一探讨和介绍。

一、多元的宗教文化

泉州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以几下方面:

(一)多种宗教聚集地

前述泉州发现保存在地上和出土的多种宗教石刻表明,泉州是世界上多种宗教的聚集地区。计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摩尼教(明教)等。现分别简介于下:

道教系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战国秦汉的神仙方术。始创于东汉末年,成熟

于南北朝,及至唐宋大盛,明清渐衰。但泉州至唐、五代发展以降,经久不衰。大量兴建道教宫观、祭坛,涌现名道士和道教研究学者是其标志。除文献记载外,还有碑刻佐证。到宋代已步入兴盛时期,此间兴建和重修了大批道教宫观。依方志就载有天应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天妃宫、花桥慈济宫、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真君殿等。又造像也颇有造诣,前述现存中国最大的老君岩是当时盛行信奉道教和道教造像造诣之深的标志。这同当时官方倡导信奉道教息息相关。至元朝,因泉州为世界通商大海港,道教的流传仍较兴盛,仍修建道教宫观,较著名的有至元十八年(1281 年),著名的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兄弟“协力捐财”重建清源山纯阳洞(裴道人蜕化处)。后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蒲寿庚之孙蒲一脚继其祖辈,再次捐资修缮纯阳洞。岩壁上镌刻阿拉伯人蒲氏祖孙的名字尚留芳迄今。明代早期至中叶道教仍相当流行。如洪武年间(1368~1398 年),重修紫帽山金崇真观,信奉天妃、关、岳诸神等。晚明及清代,虽上层道教已逐渐衰落,但泉州民间道教依然兴盛。清代重修较著名的道教宫观有元妙观、天妃宫、东岳行宫、花桥慈济宫、通淮关帝庙、府及县城隍庙、北帝庙、魁星楼等。

佛教系由印度人悉达多·乔答摩(公元前 565~前 485 年)所创立,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是当时反婆罗门教思潮之一。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 年)传入中国,在河南洛阳兴建白马寺是其标志。至西晋传入泉州,唐、五代兴盛,至宋代始步入儒、道、释三教合一时期,并渐世俗化,到明代始衰落。佛教在泉州从传入——发展——衰落过程,在文献、佛教建筑、佛教石刻方面都有所反映。

伊斯兰教系由穆罕默德于 7 世纪初在阿拉伯

半岛创立的一种神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于8世纪中叶由海路传入中国泉州,元代又从陆路传入泉州。从泉州出土多通元代阿拉伯文石碑及清净寺大型门楣石刻(长186、高50、厚15厘米),可知泉州当时就有清净寺六七座。与现存《重建清净寺碑》(元至正十年刻。明正德二年重立石,现保存于泉州清净寺内)所记:“今泉元礼拜寺增至六、七”相符。又泉州除灵山墓及附近发现多座墓外,又陆续出土伊斯兰教徒墓石。由此可窥见伊斯兰教在泉州势力强盛之一斑。

基督教系为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之各派的统称。其中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一些小教派。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称景教。据泉州出土的元代基督教徒墓碑,可知基督教是元代方传入泉州。又于泉州出土许多明代基督教徒墓碑,可知基督教在泉州于明代已很盛兴。

婆罗门教系由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北部的达罗毗荼人而创立“吠陀”教演化成婆罗门教。至公元前7世纪经改革后称印度教。据韩槐梓先生考证,婆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然据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东南亚、西南亚输入的器物推断,婆罗门教于西汉时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更大些。而传入泉州有可能是五代或宋。元代已兴盛。泉州出土大宗元代印度教石刻就是明证,其中有毗湿奴立像、摩罗、猴王雕像及“磨盘”等。

此外,犹太教、日本教也传入泉州,虽尚未发现犹太教石刻(也许已发现尚未能识别)、日本教石刻,但都有文献记载可考。

犹太教创立于公元前538年,是犹太民族的一种古老神教,信奉雅赫维(基督教《圣经》中读作“耶和華”)为“唯一真神”。天主教习称之为“古教”。12世纪初传入中国(据河南开封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记),元代传入泉州,这可从1326年驻泉州的圣方济各会派安德鲁·贝鲁亚主教给意大利的瓦余敦主教的信得以证实。信上说:“在此大帝国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信仰,自由居住……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妒忌碍。犹太人及萨拉森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从这段记述,不仅证明当时泉州犹太教之存在,且表明当时确实是多种宗教聚集地和各种宗教平等相待,各自可自由传道。因犹太教严禁崇拜偶像,所以不可能发现犹太教石造像,然泉州发现两方似波斯、阿拉伯文字石刻(尚未能读通其义),或许

是犹太教石刻(有待诠释)。

日本教19世纪末传入泉州的日本教,实属日本佛教净土宗十大支派系中的两个支派(一支为大谷派,称东教,一支为本愿寺真宗派,称西教)。据尤国伟先生撰《日本教入泉小记》载,首任日本教土水谷魁耀先祖南校场头一民屋为教堂,泉州人因它是日本人的教,就叫它日本教。”并说:“日本教虽属佛教,但可以讨老婆、不吃素,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像,讲的是佛经,符合泉州人的信仰习惯,因而颇有信奉其教的。”19世纪末,东、西教在泉州建有教堂。其中东教在泉州的势力发展很快,系因得到官绅支持,又较符合泉州人的信仰习惯。

(二) 多神的聚集地

泉州不仅是多种宗教的聚集地,而且也是信奉多神的地区,这同信奉道教及道教的日趋世俗化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又以宋代为最兴盛。这又同宋代泉州知州都很重视对道教诸神的崇奉和倡导息息相关。如知州真德秀(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后嗣弟子)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理学的“仁”的思想,在“有功于民”的根本前提下,把一切正统道教的神仙和民间道教的俗神,一概列入祭祀的对象,并借祭祀各类道教的神仙,以表达他的施仁政的为政宗旨。其做法恰与百姓对道教神仙的心理寄托相符合,因之,泉州信奉多神,除信奉正统道教尊神(三清、玉皇大帝、北极大帝)外,又信奉庞杂的民间俗神,且长期流传于民间,从而构成十分庞杂的民间道教俗神系统。如:

自然神 尊奉的天然神化的神祇有山川、社稷、城隍、雷公、电母、风伯、雨神……

动物神 尊奉龙神、金鸡神……

人物神 此类神系包括生前有功于老百姓的人或身怀异能的隐居者,辞世后被人们神化,塑像纪念、祭祀,而成为地方的保护神。如实有其人的林默娘(妈祖、天妃、天后)、吴本(保生大帝)及有功于民的官员如关羽、岳飞、蔡襄、无诸……。

守护神 系指专门保护个人或公众的诸神。如土地公、灶神、门神、境铺王爷神……

在泉州发现反映多神崇拜的石刻也很多。如:位于泉州南关外(今中山路)有一座建于宋绍兴末年奉祀吴本的慈济宫(俗称“花桥宫”),在宫门横额上尚保存题有“真人所居”的石匾。

位于清源山纯阳洞档面岩壁上保存着元至元四年(1338年)万安禅寺用平、智泰撰《重建清源纯阳洞记》的石碑一通,碑文介绍了裴道人的故事,并有“并创屋以礼群仙。扁曰‘纯阳’”的题记。

泉州知州真德秀十分崇拜蔡如金(唐朝泉州道术精深的著名道士),特为他立《蔡真人诰碑》一通。

位于泉州城西南升文铺升文山(俗称“龙头山”)上有座宋代建的铁炉庙,明代重修,今尚存(庙址迁至升文山东象峰巷,现属新华西路西面象峰巷)。庙中尚保存一通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立的修庙碑。而庙中除祀应魁圣王外,也祀观音菩萨,并祀民间道教杂神三夫妈和王爷神等。

二. 丰彩多姿的宗教石刻艺术

泉州宗教石刻艺术丰富多彩,题材广泛,雕刻技艺精湛,是泉州宗教艺术发达的主要表现。现仅择其要介绍于下:

(一)造像艺术

1. 生殖崇拜石雕造像

石且(当地俗称“石笋”),耸立于泉州新门外浮桥村附近的龟山上。系用5层直径不等的花岗石略作雕琢垒砌而成,造型颇肖男根。高达3米。现存上细下粗呈笋状,故俗称“石笋”。据乾隆版《泉州府志》载:“宋郡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石笋。”可推知原石且顶端非钝尖形,而是模拟男根雕琢而成龟头,且惟妙惟肖,才会被高氏有“私憾”之感而击断顶端(即男根龟头部分)。又据高惠连是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任泉州郡守,由此可推知石且在北宋即已存在。该石且顶端被击断后,至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由郡守张岩修补之。明黄野咏《石笋疑烟》诗云:“一片云根天琢成,锦萌择绿苔生,烟中千古亭亭立,保必婣娟映水明。”也表明此石雕系属石且,是男根的象征物。模拟男根塑且,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时代已出现,并盛行于龙山时代。考古发现少量仰韶时代陶且、石且和发现大量龙山时代陶且、石且、木且就是明证。这是生殖崇拜由崇拜女性转向崇拜男性的产物。但当时都是小型雕塑,大多小于真男根,偶有与男根相若者。而泉州现存这一石且之大,堪称中国石且之最。这一男根象征物,是生殖崇拜遗风的产物。现代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尚可找到此类原始崇拜的活化石。如四川木里县大坝村有一个被称“鸡儿洞”的,洞内就供奉一约30厘米高的石且。当地普米族未孕妇女为了祈求生育,遂到该洞里给石且烧香叩头,十分虔诚地向石且顶礼膜拜,并掀起裙子遮在石且上坐一下或蹲一下。她们信以为这样与石且接触后即能生儿育女。不过,有的学者认为泉州“石笋”是北宋时期南印度泰米

尔人在泉州留下的遗物,为印度教神祇湿婆的象征物——“林伽”(梵文音译,指男生殖器)^③。

2. 宗教石雕造像

泉州石雕造像很多,而且是多种宗教造像并存,计有道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造像等。如:

道教造像 位于泉州清源山西侧的罗山、武山南麓,有尊现存唯一的宋代巨型道教石雕像,名曰“老君岩”,又名“羽仙岩”,即老子像。系由一块天然岩石圆雕而成。老子石像昂首挺胸,悠然端坐,目光炯炯,面含笑容,神态慈祥,双耳垂肩,鬓飘胸前,左手抚膝,右手靠几,端庄大方。整尊雕像线条分明,虽整体刻工显粗犷,但额褶、飘鬓细部雕琢精细,刀法娴熟,柔中有刚,表现了宋代的手法和风格。此尊老子石雕巨像,坐高5.1米,宽7.3米,厚达7.2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老子石像^④。

摩尼教造像 位于泉州晋江罗山苏内华表山麓的一座元至正五年(1339年)改建的单檐歇山顶石构建筑的正厅后壁,以天然崖壁为后墙的墙中部,有尊浮雕坐莲波斯摩尼佛像,系依花岗岩崖壁(厅后壁)中部浮雕而成。即先在正厅后壁中央雕琢一圆形浅龛,尔后在龛内浮雕一尊盘坐于莲花坛上的摩尼佛像,容貌慈祥,面部圆润,眉脊隆起,双耳垂肩,散发披肩,鬓垂及胸,双手平置于盘腿上,掌心向上。面、身、手三部分巧用俏色雕法,即利用岩石的不同自然色泽构图(面稍青,身呈灰白,手呈淡红),形色自如,出神入化。像高152、宽83厘米,背衬光轮,毫光四射,俗称“摩尼光佛”。这是中国唯一保存至今的明教石雕偶像,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石雕摩尼像。1991年2月中旬,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抵草庵摩尼教遗址考察,当专家们看到寺内这尊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摩尼光佛时,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官员迪安博士激动地向中外记者、学者郑重宣布: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最大发现,最大成就。

喇嘛教造像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景区内有三尊为中国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喇嘛教岩壁石雕像,当地居民称之为“三世佛”。“三世佛”是13世纪以来藏传密教(俗称“喇嘛教”)佛堂中供奉的主要佛像。碧霄岩“三世佛”系高浮雕于岩壁上—长方形(高3米、宽6.5米)大龛内。三尊佛像呈一字形并排结跏坐在仰莲座上。左尊为过去佛,作触地印之降魔相,左托钵;中为现在佛,亦作触地印之降魔相;右尊为未来佛,作施定印之禅定相。皆为土蕃形象,神态自若,属元代佳作。据载此为元代泉州路

监临官——达鲁花赤阿沙(宁夏灵武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登临清源山,感岩之雄伟,造崖而雕,筑殿供奉。

婆罗门教造像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厅中展出一尊1934年出土于泉州南校场的婆罗门教(亦称“印度教”)石雕像——毗湿奴像(印度教崇奉的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之一,呈伫立姿,头戴高帽,双目下垂,鼻梁高耸,双耳垂肩,有四只手,各持法器,其中一手作无畏状,上身袒裸,下体似着罗衣(紧身),直立于半月形的莲座上。通高115厘米^⑤。

岩壁雕释迦瑞像 位于泉州清源山左峰半山腰,依岩壁雕凿释迦瑞像一尊,高4米,宽1.5米。像呈立姿,左手下垂,掌心朝外,右手露肩作无畏手印,其造型取法于木刻的旃檀瑞像而别具一格。旁刻雕造时间,可知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的作品,也是福建有文字可考的宋代造型艺术佳作之一^⑥。

岩壁雕阿弥陀佛像 位于清源山右峰南面半山腰,保存一尊元代依岩壁雕凿的阿弥陀佛立像。高5米,宽2米。头结球鬘,面容丰润,右手下垂,左手平放胸前,足踏莲花,貌相慈祥,神态端庄,雕工精致,造型生动,风格古朴,有较高艺术造诣^⑦。

达摩像 在泉州崇福寺内供奉一尊宋代一小型石雕达摩像。高58厘米,宽22厘米。像呈坐姿,头向右侧,无发,合眼,闭嘴,两颊皆须,面部形象肖西南亚人。双手平抬合抱于宽大的袈裟里,足履僧鞋外露,衣褶刻工精细,线条流畅。达摩为印度僧人,中国佛教禅宗追溯为该宗派的始祖^⑧。这表明宋代崇福寺曾是南禅宗寺院。

观音坐像 位于清源山东侧的赐恩岩清代建的佛殿内供奉一尊白衣观音,雕于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观音呈坐姿。高4米,肩宽1.92米。六道垂发分披两肩上,双手切合掌心向上,慈目低垂,神态端庄,雕工精细,形神兼备。

此外,泉州还有大量的佛教造像。如清源山瑞象岩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雕的释迦牟尼像,弥陀岩元代雕的阿弥陀佛、赐恩岩北宋元祐雕的观音像等。这类作品都已为人们所熟知,在此恕不赘述。

(二)装饰性宗教艺术

装饰性宗教石刻艺术,系指宗教建筑(如宫观、寺庙、塔、经幢等)及石碑上的石雕装饰。具有代表性的有:

开元寺的石雕装饰 泉州开元寺,位于市西街。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开元十六年(738年)

改今名。宋代有支院百余所。元至元二年(1285年)并成大寺,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现寺占地约50亩,建筑规模宏大。其主要建筑有:东西塔、大雄宝殿、甘戒坛、藏经阁、功德堂、尊胜院、水陆寺、檀樾祠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建于唐垂拱二年,现存为明代重檐歇山顶建筑。高20米,面阔9间,进深6间。原应立柱百根(实只有94根,被偷减6根),故又有“百柱殿”之称。现存石柱中的石雕装饰,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殿后廊上的一对青石柱,两柱同呈方体,四面均雕饰婆罗门式浮雕多幅流传于印度、锡兰的神话故事图。雕工精湛,线条细腻,形象生动。从石柱雕饰图可判断这一对石柱系属印度婆罗门教建筑遗存。据传这对石柱是明代修葺时从已成废墟的婆罗门教寺庙遗址迁移至此,是已知中国现存佛教建筑中所绝无仅有的装饰。另于殿前的石月台“台座前壁面束腰处砌筑的青石面饰有浮雕人面狮身72幅,神态各异,造型生动,栩栩如生,也是从印度教寺遗址迁移至此。而寺前东西对峙耸立的双塔,系以山门、大雄宝殿为中轴线东西对称而立(两塔间相距200米),俗称东塔、西塔。东塔(名镇国塔),始建于唐咸通六年(865年),后易木塔为砖塔,从宋嘉熙二年(1238年)至淳祐十年(1250年)改建成石塔。塔高48.24米。西塔(名仁寿塔),于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年)始建木塔,北宋政和年间改建为砖塔,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改建成石塔。塔高45米。现存东西两塔皆为南宋改建的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构的花岗岩石塔,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其裸露的塔基部分及塔身皆饰有浮雕。各层塔身门、龕(每层4门4龕两者位置逐层互换)两侧均饰浮雕武士、天王、金刚、罗汉等多达80尊。两塔共饰160幅图,其中东塔须弥基束腰部饰浮雕佛殿图39幅,题材有如释迦牟尼本生、本行故事图及“童子求偈”、“太子出游”……皆取材于佛经及古印度的民间神话传说;又如“道树降魔”、“僧到赤乌”、“薄荷示踪”、“禽警青蛇”等佛传图浮雕。这些石雕佛教神话故事图的内容虽大都取自印度,但其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布置却已全部汉化,且采用中国绘画雕刻的传统手法表现之,颇富宋代的雕刻艺术风格,堪称是中西合璧的代表作^⑨。

天后宫的石雕装饰 泉州天后宫位于鲤城区南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系祀莆田湄洲林氏之女(默娘)。相传林女为海神,曾显灵保护海上舟楫,为世人所尊,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建庙奉祀之。据《泉州府志》记:该庙当时系亚非诸国的

“蕃舶客航聚集之地”。因宋代泉州已是世界著名的商贸港口,中国对外交通的主要港口。至元代,泉州港又跃居为中国最大的港口。林女(默娘)仙游后被神化为海神,在海内外影响越来越大,故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遂始封“泉州神女”为“天妃”。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经出使西洋的郑和奏请,奉旨重修。明代派官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国的使节,皆到此祭告祈祷。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统一台湾,泉州人施琅奏请此神显圣助阵,神号遂由“天妃”晋封“天后”,庙称“天后宫”。现存大殿、后殿、两翼亭子及东部尚保留清初时的原貌^⑩,大殿石柱饰高浮雕兼透雕云龙。有趣的是,于后殿立有两石柱为婆罗门教式石柱,其装饰与前述开元寺所见由婆罗门教寺移来的两石柱大同小异,表明应是把婆罗门教寺的建筑遗物迁移至此,而使神教在建筑上融于一体。

此外,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石刻陈列室还展示大量伊斯兰教石刻、景教石刻、婆罗门教石刻及部分建筑石雕构件,并大多饰有浮雕装饰图案画面。

(三) 摩崖石刻艺术

以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风摩崖石刻最为著名。泉州南安九日山现存宋代祈风摩崖石刻多达10方,是研究宋代祈风制度及中外友好往来的珍贵资料。

泉州市郊马甲山双髻山上摩崖石刻10余方,其中以宋王十朋所书“佛国”的题刻最为著名。

(四) 碑刻艺术

泉州有大宗宗教碑刻,以前散见于野外者,现已大多收藏于泉州海交馆内,并设专题馆——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宗教碑刻,系指与宗教相关的碑刻类。分伊斯兰教、古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四个部分展示之。其中以伊斯兰教石刻最突出,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均为全国之冠。展品中除有大量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寺庙的建筑石构件、墓碑、墓盖等外,还有多种宗教碑刻。其中不少碑刻系镌刻波斯文、阿拉伯文、聂斯脱里文、八思巴文等。现就保存于原处和收藏于海交馆内的宗教碑刻择其代表介绍于下:

伊斯兰教圣墓碑廊 位于现泉州市东城区的灵山上有座伊斯兰教圣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闽书》记,于唐武德年间(618-626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默德派门徒四人来华传教,其中二人(三贤、四贤)到泉州传教,卒葬于泉州灵山。这两位异邦先贤得到泉州人民的尊敬,圣墓由此而得名。位于墓后倚山建马蹄形回廊环抱墓室,廊内立有历代碑刻五通,正中一通为元至治三年(1323年)立的

阿拉伯文辉绿岩碑刻,碑文记述三贤四贤的事略及重修经过。

《敕谕》等石碑 位于泉州市涂门街中段的清净寺(图四)。创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修建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现存元代重修的正门楼和礼拜大殿。该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门楼北墙(石砌而成)上尚保存阿拉伯文碑刻,即于北墙左右嵌有两方阴刻“月”、“台”石刻。入东墙尖拱形正门可看到西墙正中有一尖拱形高大壁龛,龛内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更值得一提的是,寺内保存有一通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年)颁布保护清净寺和伊斯兰教的《敕谕》石碑^⑪。清净寺及寺内保存的碑刻,都是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基督教十字架碑刻 基督教于唐代传入中国系称“景教”。至元倾宋,景教随蒙古军力自中亚、内蒙等地再度往东南传播。此时,景教改称“也里可温”(arkoun)。据陈恒先生《也里可温考》记,元代流传的也里可温教,含聂斯脱里(景教)教派和圣方济各会(天主教)派。有关基督教的十字架碑刻在泉州自明代以降陆续有所发现。如于1940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出土一通元代基督教徒(聂斯脱里教徒)的墓碑,碑阳阴刻汉字和叙利亚文字各两行。据日本顺天堂大学村山七郎教授对碑上叙利亚文字(用叙利亚语字母拼写的突厥语)的翻译意:“在公元1313年,聂斯脱里教主教矢里门师,死于泉州。”(据1963年日本村山七郎给郭沫若的信)。此外,自明代迄至上世纪40年代泉州发现十字架石刻多通。而泉州的景教碑刻曾被称为刺桐(泉州别称)十字架^⑫。

印度教石碑 1956年吴文良先生曾在泉州南门五堡街发现一通石碑,断裂为二,其上刻有印度泰米尔文字和汉字的碑文。可知此石碑是公元128年,泉州港主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刻立的南印度泰米尔文字印度教石碑。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泉州发现印度教石刻、石碑多达300多方。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新发现。

(五) 浮雕艺术

力士柱础 泉州佛寺建筑构件中的石雕柱础,有的饰浮雕力士。如1946年于泉州南门城基出土1件宋代大型力士石柱柱础面,高82、肩宽34、跪膝高29、头顶直径30厘米。力士额上刻有深皱纹,大眼,眼皮下垂,大鼻,宽嘴,双耳垂肩,头顶戴菩提树叶编成的帽子。上身裸露,腰部缠带打结,赤脚,左膝跪

地,左手撑腰,呈用力状。足踝、手腕皆戴镯。从貌相看,当是塑造西南亚人的形象,雕刻技艺娴熟。

佛传图 前面介绍开元寺镇国塔时曾述及该塔须弥座上饰有浮雕佛传图。考古学家认为,这一佛传图雕刻群,堪与南京栖霞寺、山西云冈石窟的佛传图雕刻媲美。1935年,瑞士人载密微(P. DEMIEVILLE)、德国人艾芝(G. EDKE)合撰《刺桐双塔》(《THETWIN PAGODAS OF ZADYION》)一书中曾把这一佛传图石雕群赞誉为“神奇的雕刻艺术”。

(六) 经幢石刻

经幢,属佛教石刻。其形体呈塔状,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段,并分别雕刻后台为一体。座多见覆莲状,下设须弥座;身呈柱状,多见八面体;顶一般作仿木构建筑的攒尖顶。幢身常刻有佛经或佛像。泉州曾发现许多经幢,已知始见于唐代,多见于宋代。其代表作有:

尊胜陀罗尼经幢 原位于泉州西门外,1935年发现,1953年移入泉州开元寺保存。建于唐朝大中八年(854年)。通高1.78米。身呈六面柱体,每面宽0.25米,每面刻字7行,楷书,每行64字。末面题职名,字数不等。其中一面刻0.1米的直线浅槽一条。该幢有篇序文,专门申明立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用意。序文中说此经是专门“救拔幽星”,其效用是“不可思议”的,并记述该经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故事以论证。

八尊佛像石经幢 原位于泉州西门外(与前述尊胜陀罗尼经幢同处)。1955年10月发现,1956年3月林惠祥教授将此佛像石幢移至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

桃源宫陀罗尼经幢 位于南安县丰州镇(现泉州市丰州区)桃源村的桃源宫天井中。该幢建造于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石构。身呈八面柱体。高约7米,共分7层。基座为八角形须弥座,八角柱各雕饰侏儒,束腰处雕饰飞天。其上为八角形平座,饰刻水波纹,置有覆盆。第一层幢身浮雕双龙戏珠;第二层浮雕姿态各异的佛像。第四层分行竖刻“尊胜陀罗尼经咒”,上端横排镌刻“奉为今上皇帝资崇佛幢一座”。四至六层施用挑檐翘角,间以仰莲一朵;第七层幢身上檐均作方形,出檐部分雕饰蝴蝶状飞人;幢刹作葫芦状。除基座用多块花岗岩石砌成外,余皆整石雕成^③。

此外,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泉州城区陆续发现和出土一批批印度教寺庙和祭坛的石雕建筑构

件。其中有十六角形石柱、哥林多式柱头、雕花梁架石、莲花瓣门框石、半鸟半兽门楣石、兽面人身石雕、人面羽翼石雕、人面狮身石雕、石卧牛等。仅于1959年在泉州城西北隅平水庙附近的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宿舍工地出土的一批就多达12件,计有希腊式石柱头、哥林多式石柱础、半人半兽门楣石及蛇形图案石雕等。

三. 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对泉州宗教石刻的介绍和初步探讨,我们有以下几点初浅认识:

(一) 泉州宗教石刻十分丰富,数量多、种类多、题材广是其标志。这些石刻为我们探讨泉州秦汉明清历代的政治、经济、商贸、宗教、文化及宋元明泉州港在国内外所处地位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 泉州的宗教石刻反映了泉州多种宗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甚至相互融合。如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早在宋代就很盛行。道教融入了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行善积德、轮回报应之说。佛教改造世俗化道教,于九日山道教通远王神的祀神仪式,由杀牲祭神被改为佛教水陆以蔬食祭祀仪式……凡此,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一些表现。又如宋末阿拉伯人蒲开宗倡修宣扬儒道的倪思祠。蒲寿庚兄弟捐资修缮清源山纯阳洞的佛、道寺院。元代泉州的景教称基督的“佛”,并有“非佛后身,亦佛弟子”颂词。同时称主教为“大德”,在教职中有“待者长”之职名,这些称谓是袭用佛教的用词。再如宋末元初,泉州一女景教徒用儒家的礼教规定的辈份称谓称已故的两位婆婆为“故妣两亲”,又称“陈氏十太孺,郭氏十太孺”,而自称“载舍王氏十二小娘”。复如元代的明教,也称摩尼为“摩尼光佛”,并施舍建寺、造像。元代的印度教徒为感谢皇帝赐给神像,竟刻碑“御碑佛像”以留念。而明代泉州的伊斯兰教清净寺竟然按道教和儒家的要求,以象天、方象、太极、俩仪、四象、八卦和乾元等形式进行修缮和改建。然基督教石碑上所雕刻的飞天,有的甚至就是“佛像”。又日本教本来仅供奉释迦牟尼像,在泉州东、西教堂则同兼尊奉观音菩萨。凡此,都是各种宗教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具体表现。

(三) 泉州发现和保存多种宗教石刻充分反映了泉州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泉州都可自由信仰、自由传道,和平共处,

既各自发展,又相互交融。这对当今世界上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因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而大动干戈,乃至战火不断来说,对泉州宗教的研究颇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泉州道教文化十分发达,且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其表现主要有:道教传入早,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学道方士抵泉活动。庙观兴建早,早在晋太康年间(280~289年)即兴建白云庙(唐初改称中兴观,后又改称龙兴观)。名庙宫观多,两宋所建尤多,计有城隍庙、东岳行宫、花桥慈济宫、天妃宫……。名道学著作多,如李贽等所撰多部专著被收入明代编的《道藏》中,对道教俗神的信奉,流行信奉人神化的神,其中都是有功于民的名医、名宦、乡贤、名道士等。对外影响深,宋元明时期尤甚。

由于当时泉州是海外交通贸易大港,又海船航行主要靠风力,人们总是祈求海神能庇佑顺风航行。宋代政府每年两次在九日山通远祠为中外海商举行大型祈风典礼,九日山上尚保存多方祈风岩壁石刻。另宋代还曾在法石真武庙举行祭海活动。这类祈风、祭海的道教礼仪,对外国海商的心灵有着深刻影响。又如建天妃宫尊奉被誉为“海神”的天妃,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盛,泉州海商及侨居国外的泉州人把天妃崇拜也传到海外。明末郑成功驱荷复台时,把天妃信仰传至台湾。施琅平台时,以天妃增潮济师奏请晋封天后。天妃崇拜在台湾和海外得到进一步传播。另泉州人崇拜的医圣吴真(真人),也随着泉州人东渡开发台湾和移居海外而广为外传。如今在台湾供奉吴真人的宫庙多达240余座,可知台胞尊奉

吴真人经久不衰,且趋日盛。此外,被奉祀在泉州城南富美宫的萧王爷(西汉太傅萧望之)及故乡所奉祀的其他诸神,也随着泉州人的迁居而传播到台湾和海外。这种对台湾和国外的影响,世代相传,迄今已成为联系和增进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人民情谊的“神缘”,而具有现实意义。

泉州保存的宗教石刻极为丰富,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的实物证据。泉州不愧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宗教石刻,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阿拉伯、东南亚诸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见证。

注释:

(清)乾隆《泉州府志》。

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 袁一锋等:《中国宗教名胜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⑤、⑥、⑧、⑪、⑫、⑬ 吴国雄:《泉州宗教文化》,鹭江出版社,1993年。

⑨、⑩ 福建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福建名胜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许智范)

(上接第92页)

⑤ 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战国墓清理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⑥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贵溪县博物馆:《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

⑦ 江西省博物馆:《南昌东郊西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⑧ 郭远谓:《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65年第6期。

⑨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西南昌市郊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4期。

⑩ 陈柏泉:《上饶发现雕刻人物的玉带牌》,《文物》1964年第2期。

⑪ 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

物》1987年第2期。

⑫ 冯汉骥:《王建墓内出土的“大带”考》,《考古》1959年第8期。

⑬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⑭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棖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⑮ 陈文华:《江西南城明益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

⑯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⑰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汪兴祖墓清理简报》,《考古》1972年第4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